

# 中美大使级会谈围绕台湾问题的交锋

■ 梅兴无

1955到1970年间，中美两国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使中美两个尚未建交的大国有了一个接触和对话的平台。而台湾问题始终是会谈的焦点，双方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博弈。中方的坚定立场使美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 中美启动大使级会谈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开始改善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23日，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4月26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不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但直到6月中旬才通过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向周恩来转达进行大使级谈判的愿望。7月15日，周恩来表示同意。25日，双方同时公布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

1955年8月1日，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



1954年，周恩来（左三）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下榻处，左五为王炳南。

国联大厦举行。中国首席代表是1955年4月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美国首席代表是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其实，这二位曾是交锋过的老对手。

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都希望进行直接接触。从6月5日到6月21日，时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成员约翰逊先后举行了4次会谈，双方分别就中国在美侨民、留学生和美国在华被押侨民及美国军人的问题，阐述了本国的主张和要求。尽管没有达成如何协议，但双方都不愿意就此中断接触，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双方进行了17次不定期的领事级会谈，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美两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大国有了一条表达意见的渠道。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拉开序幕。中方的宗旨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放弃其敌视和分裂中国的政策，从台湾海峡撤军。为此中方提出了两个会谈议题：一是美国对华经济封锁和禁运；二是举行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以缓和台湾紧张局势。美方则提出了三个议题：一是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人员；二是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三是偿还美国在大陆的外交财产。双方分歧很大，但为了使会谈先启动起来，双方都作出妥协，最后达成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即双方均可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前夕，中国政府为表达和平友好的诚意，于7月31日宣布将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下了一手先手棋。约翰逊只得表达谢意。在第一项议程下，双方就朝鲜战争中被俘人员和平民返国问题进行了14次谈判，终于于9月10日达成了两国大使级的联合协议声明，主要内容是：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这份协议是双方在15年会谈中唯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这个协议是双方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搞的一个各说各话的杰作，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签署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文字表述模式。

根据这一协议，中国要回了包括钱学森博士在内的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

导弹研发作出了不世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别的不说，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胜利！”

## 台湾问题是会谈的焦点

1955年9月19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转入第二议程，谈判议题聚焦台湾问题。当时美国驻军台湾，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会谈中的重中之重。

10月8日，约翰逊就台湾问题建议双方分别发表声明，“表示除防御外将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意图很明显，要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使台湾与大陆永久分离，制造“两个中国”。

周恩来就此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湾已成了国际争端，台湾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但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自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内政，美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混淆的。

王炳南在谈判中也向约翰逊明确阐述了上述立场，并于10月27日，主动就美提出的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中方第一个协议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遭到美方拒绝。

11月10日，约翰逊提出美方的第一个协议草案，仍是建议分别发表声明，在台湾地区“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美双方都放弃使用武力，这等于要求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和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理所当然地遭王炳南拒绝。

12月1日，王炳南提出新的协议草案，中方不再坚持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建议，重申了两国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诉诸威胁或武力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但美方不接





1955年，王炳南（左三）与约翰逊（右三）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受中方的草案，仍然老调重弹，只有中共很好执行了第一个协议使滞留人员早日返国，才能达成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至此，会谈陷入僵局，中美相互指责对方，12月22日双方决定暂时休会。

1956年1月12日会谈复会后，美方提出了新草案，仍旧强调在台湾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力”，还将不诉诸威胁或武力的地区从台湾扩大到了“台湾地区或其他地方”。王炳南义正词严地指出，应尊重每个国家有自卫权力的原则，问题在于该原则的适用地区，如果美国在其自己的领土内行使这权力，中国是不能反对的；但假设中国占领了旧金山，然后又声称是自卫，美国能同意吗？此后，双方就是否要将“单独和集体自卫”条文写入协议声明争执不休。

4月19日，美方提出第三个草案，在坚持“不损害各方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力”之前，加上了“在不损害各方用和平方法执行自己的政策”一句。对此，中方表示仍无法接受。

5月11日，王炳南也提出了新的草案，建议“在不损害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互不诉诸威胁或武力”，此外，该草案还提出了两个月的时间限制，以防止美国无限期的拖延会谈，并再次提出了外长级会谈的要求，但是美方认为该草案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6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美国的方针就是拖，如果拖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跟他拖；如果拖对

我们不利，我们随时都可以不跟他拖。

此后，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会谈中多次交锋，基本没有进展。1957年12月12日，约翰逊在会谈中奉命宣布，他将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由他的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奉命严正指出：“这样做很不严肃。中美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方想降级，中方一再敦促美方尽早指派大使级代表，美方却一再置之不理，致使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 会谈降温台海紧张局势

1958年7月，美国出兵黎巴嫩，中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与此同时，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轰炸福建，骚扰江浙，派飞机至大陆云贵川康青等省散发传单，空投特务。美蒋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台湾海峡硝烟弥漫，情势险恶。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是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先收复沿海岛屿，1954—1955年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一江山和大陈岛的战争就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第二步再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炮击金门、马祖，准备收复这两个岛屿。

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该岛的海空通道，切断其补给线。美国立即从地中海和其他海域调集军舰来加强第七舰队的兵力，在台湾海峡集中了7艘航空母舰和100多艘其他战舰以及大批空军力量。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美国将不放弃它已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派美舰给蒋舰护航。

8月底，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飞回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炳南在会上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还回答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提出的涉台问题。会议决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方案。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湾之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同时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大使级会谈。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处于中断状态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把握不透，急需通过恢复会谈摸清中国的底细，于是美国当天即作出反应，表示愿意恢复大使级谈判，并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重启谈判的代表。中方谈判代表仍是王炳南。经过协商，会谈地点改在华沙，双方代表不必奔波到第三国开会。

王炳南在去华沙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嘱咐他谈判要多动脑子，谦虚谨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对美国人说话时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要多用劝说的口气，譬如，你们美国何必为不到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9月15日，第74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王炳南根据中央“两步走”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2)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

中方在草案中释放了诚意，并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案。但美国代表比姆回绝了中方的草案，坚持拒绝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力量，甚至没有把上述草案文本接受过去。

9月18日，比姆提出了美方的协议声明草案，要求中国对金门、马祖放弃使用武力，除非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为，美国也保证不对大陆及其沿海岛屿使用武力。中方对等回应，拒绝对方的草案。

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公开表示，“美国没

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此后，艾森豪威尔又向记者说，金、马对台湾“并不是极为重要的”。美准备改变策略，要蒋让出金门、马祖，以换取中国不用武力解放台湾，在金门与台湾之间划线，制造“两个中国”。

同日，在第7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比姆抛出据称是杜勒斯亲自起草的协议草案，以平行的口气阐述了中美双方对金门、马祖的不同立场，在阐述中方立场时特意指出苏联支持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在阐述美方立场时强调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称美国对台湾的集体防卫负有义务，要求中国停止对金门、马祖的敌对行动，寻求通过谈判、媒介、调停、仲裁以及司法手段来解决上述争议。王炳南驳斥了美方的草案，指出这是美方为掩盖其侵略行为，使其占领台湾合法化，同时也是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服务的，故没有讨论的余地。

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

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会谈中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揭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故意混淆国共之间内政矛盾与中美之间国际矛盾的伎俩，几轮会谈下来，中方阐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摸清了美国“以金、马换台、澎”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意图。在这一阶段，中国通过炮击、和谈两手，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挫败了美国要求“停火”的计划，又摸清了美国的意图。

为了粉碎美国分离大陆和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央将原来的“两步走”战略调整为“一步走”战略，即暂不解放金、马等岛屿，待时机成熟，再一并解放台、澎、金、马，统一中国。

王炳南根据“一步走”战略，提出了一个关于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草案，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保证从台、澎和台湾海峡撤出其一切武装力量。尽管这一草案美方未能接受，但美国没能达成逼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目的，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破产。由此，中国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

同时，中国政府也宣布，炮击金门实行“单打双不打”。因此，美国也决定，只要中国在双日不打炮，蒋军



可得到补给，“美国将不再参加护航活动”。至此，台湾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但美敌视中国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

### 一揽子解决问题突出台湾

1960年上半年，中国政府确定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新原则：“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这一原则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1960年9月6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了100次。王炳南就此发表了一个总结性谈话，指出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为谋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国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并着重强调，缓和和消除台湾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

1962年3月，美国改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同年5月，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把他召到家里谈台海局势：“蒋介石认为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在外我们与苏共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看来蒋介石是想大干一场。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蒋介石和美国的动向。”几天后，周恩来要王炳南马上停止休假返回华沙，指示：“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

周恩来还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解决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台湾问题，要看‘二王’：一个是王炳南在华沙和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率领10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

王炳南赶回华沙后，6月23日，与卡伯特的会谈以非正式方式进行。王炳南指出，蒋介石一旦向中国大陆挑起战争，绝不可能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而美国必须对蒋介石的军事冒险和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并警告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1964年，王国权（左）出使波兰，检阅波兰仪仗队。

卡伯特赞赏王炳南的坦率，并允诺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中方关切，表示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防止这种事情。会面结束时，卡伯特还强调：“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3天后，卡伯特正式表态，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炳南立即将美国的态度报告北京，周恩来夸赞王炳南说：“炳南同志，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蒋介石在获悉王炳南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后，表示“极为不满”，恼怒地指责美国“敌友不分”，其“反攻大陆”的痴心妄想也随之泡汤。

20世纪60年代，在一揽子解决问题原则的指导下，历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几乎都提出了台湾问题，但中美双方的立场存在根本分歧，中方要求美方从台湾撤军，美方要求中方放弃在该地区使用武力，互不妥协。正如王炳南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会谈几乎千篇一律，我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王炳南同美国大使谈了9年，会谈达120次。1964年4月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新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走马上任，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

1965年12月16日，在举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约翰离任，接替他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格氏表示：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建议实现记者、医生、科学家等互访，向中国发动和平攻势。王国权按国内的指示表态，台湾问题未解决，其他问题免谈，回绝了他的建议。

此后，由于“文革”的原因，中美大使级会谈几乎处于停顿状态，3年间双方只进行了15次会谈。在第134次会谈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

## 双方开始展现出灵活性

随着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美国与苏联争霸全球，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即释放出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中断了两年。尼克松在白宫召见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指示他“以一种非常谨慎并且

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中国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

12月3日，斯托赛尔参加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周展览会，斯托赛尔和会谈事务秘书发现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错把李举卿当成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紧追不舍，向中方人员表达要求与中国代办会见，谈尼克松“希望与中国进行重大具体会谈”的意图。中国代办雷阳知晓后，立即向国内报告。12月9日，国内电示：代办可与美大使会见。

随后，斯托赛尔和雷阳分别于12月11日与1970年1月8日到对方大使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斯托赛尔代表美方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同意。最后双方确定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月20日举行。

周恩来审阅修改了中方发言稿和外交部给雷阳的指示电稿，他在发言稿上加写了一段文字：“在我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同日，周恩来将发言稿和指示电稿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如期举行。雷阳在阐述中方立场时聚焦台湾问题，要点是：(1)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国家强占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损害其主权，干涉其内部事务，怎么能和平共处？中国不会侵略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也绝不容忍其他国家干涉或侵略中国。(2)台湾问题是中美长期存在严重分歧的症结所在。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是意识形态问题。美国企图通过与台湾当局缔结条约使强占台湾合法化，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美国长期把台湾当作对中国人民发动战争威胁的基地，最近又谈到遵守对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承诺”，向其提供军事战斗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3)中国一定会解放台湾，绝不允许他国占领中国领土。在这个涉及政治原则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任何期望中国在此问题上改变立场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在于美

方总是想讨论一些细枝末节问题，而回避根本性问题，即台湾问题。(4) 中方一贯主张用协商与和平手段解决中美间的争端，准备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考虑如何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中方愿意考虑和讨论美方希望提出的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致的任何想法和建议。(5) 这样的讨论可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来进行，也可以通过更高级会谈或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来进行。

斯托赛尔回应，强调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绝不妨碍对此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唯一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不要通过武力解决，“我感觉我们都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和平解决”。

雷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美蒋条约”不会被全中国人民承认，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将会把美方提出的派代表去北京或美方接受中方代表至华盛顿的建议转达中国政府。

斯托赛尔请求雷阳解释“更高级会谈或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的意思，雷阳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有兴趣在更高级或通过其他途径会谈，可以提出具体建议或在大使级会谈中通过协商定出方案。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在试探。中方想要得到美方的一些确认，即美方要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内政，美方不支持“两个中国”，并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对美方而言，美国要求确保台湾不会受到攻击，保持对台湾当局的承诺，试图“使台湾的地位问题模糊化”。

### 奠定两国最终走向和解的基础

1970年2月2日，中方提议2月20日举行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2月4日，美方回应表示同意。

斯托赛尔在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中方“更高级会谈”的意愿时，特别强调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变化”，中方虽继续提到美国占领台湾，但并没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撤出，也没有提以往反复强调的“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用和平或武力解放台湾”，而提到了用和平手段。

基辛格建议尼克松授权其告知国务院：总统对国务院拟定的对中方关于在北京或华盛顿会谈的建议，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尼克松予以同意。2月19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将修改过的对“更高级会谈”持更加

积极态度的指示，发往华沙斯托赛尔。

中国政府对“更高级会谈”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方发言稿关于这一问题的措辞，将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还在修改处加了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一三五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同日，周恩来将修改稿报毛泽东。毛泽东审阅后批示：“照办。”

2月20日，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雷阳首先发言，他的陈述中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方对更高级会谈的兴趣。他指出，中方愿意通过协商来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方一贯主张只有两国间的根本原则问题，即台湾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然后中美关系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中方也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创造条件。但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美方的基本立场没有多大变化：一是美方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又声明要保持与蒋介石集团的“友好”关系；二是美方表示愿意与中方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声称要遵守对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承诺”；三是美方认为中国有权把台湾问题作为内政来解决，但又不放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此，雷阳质疑：“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雷阳接着指出，为了解决这个重要矛盾，更加深入的探索是必要的。然而，通过两国大使级会谈来执行这项任务会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部长级代表或一名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间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斯托赛尔表示，中方在上次会谈中表达的观点已经得到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充分考虑，并陈述了美方立场：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应该由相关各方直接解决，解决应该通过和平手段，不要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美国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美国会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减少其军事存在。

他还表示，美国不仅愿意讨论台湾问题，而且愿意





1971年7月，周恩来会见秘密访华的基辛格。

讨论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中方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的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来北京探讨中美间的根本原则问题，大大鼓舞了尼克松。3月13日，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想把会谈搬到北京举行，建议告诉中方，美方同意更高级会谈。3月20日，基辛格通知国务卿罗杰斯，尼克松已命令斯托赛尔在会谈中以积极的方式提出美方的立场，寻求共同点，以使美方推进更高级会谈的意图得到充分确认。

3月21日，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方传达了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访华的通道逐步打通。周恩来在相关文件上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美双方确定今后通过巴黎进行秘密联系。至此，中美大使级会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最终落幕。

中美大使级会谈始终聚焦台湾问题，特别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除继续坚持各自的原则立场外，也展现出不同程度的灵活性。美方在这两次会谈中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主张，不仅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也为其以后的对台政策定了基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在让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同时，不再强调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就是这种灵活性，促使中美两国走向和解，打破了中美关系坚冰，美国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sup>[7]</sup>